

一定要摆正个人的位置和心态

——重温陈云《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 卢 毅

重读经典

延安时期，陈云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参与组织培养和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为党的队伍和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5月9日，他在党的七大上发言时根据自己对干部队伍整体状况的了解，批评了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号召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个发言后来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题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今天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

陈云在发言开头就尖锐指出：“这七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什么是骄气？就是骄傲之气。”许多人喜欢受吹捧、喜欢人家说他好，说他有功就舒服，不愿挨批评，说他犯错误就不舒服，“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有功的时候他一定当仁不让，有过错的时候批评他，他总是想很多道理来为自己辩解。这种状况在延安整风后虽有较大改进，但尚未绝迹，在“很大”的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

陈云根据自己的观察判断指出，这些带骄气的干部既有地方的，也有军队的。与此同时，这种骄傲之气在下级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他深入分析，下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骄气虽然性质一样，都是觉得自己有功劳就骄傲自满，但二者的“包袱”有所不同。这里的“包袱”是指“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里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下级干部“包袱”还不算太重，陈云形象地比喻说：“下级干部虽然背个人主义这个‘包袱’，但他只能背那么重。比如当一个连长，他只能背一条被单，两双

鞋子，一包牙粉，一把牙刷，身上只有这一点。”而高级干部的功劳比较多，因此“包袱”重得多，“大干部、大头子，党头、军头，就有大行李。有被子，有褥子，有时候有两条被子，还有毯子”。

在陈云看来，高级干部责任重大，如果背上个人主义的沉重“包袱”，肯定影响其前行的步伐，“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中级干部”。他语重心长地说，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干部的责任很大，高级干部的责任更大，关系到人民能否翻身解放、解放得早还是迟、少牺牲还是多牺牲几十万人，可以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高级干部既然担负如此重任，就一定要兢兢业业，防止骄傲自满，一切应该丢的“包袱”统统丢掉，否则便是没有对人民尽到责任，“人们说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

“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

陈云深入剖析“骄气”的思想根源，指出有的人之所以骄傲自大、背上个人主义“包袱”，是因为没有正确看待功劳。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绝不可把次序颠倒过来。首先，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无论英雄好汉存在与否，革命都不会停顿，“老百姓还是要革命的，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可见头一条不是英雄好汉，而是人民”。因此在对待功劳时，一定要把人民放在首位。第二是党的领导，陈云强调对党的作用必须有充分估计。他举了军队的例子，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打不垮，就在于有党的领导。长征中天天行军打仗，战士非常疲惫，但如果上面决定要打，任何人都可以马上投入战斗。长征时条件那么艰苦，但谁也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一直跟着队伍走，“因为这种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在别的军队里，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叛变，就可导致整支部队哗变，可是共产党的军队谁

也带不走，这就是党的力量。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也是因为党的影响。老百姓“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这一切证明我们党的力量是伟大的”。

至于个人的作用，陈云认为当然不能完全否定，有时还会起很大的作用，但“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是共产党”。一个人工作做得不错，那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适应群众的要求，做了一点事而已，不能因此骄傲。况且每个人在工作中都难免犯错误，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因为自己有缺点，只做到八分或六分、五分，这种情形是很多的。对此，陈云反问道：“那这里头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客观情况很好，本来可以做到十分，但因为自己有错误，没有一点成绩或只有二分、一分成绩，错误有八分、九分，“非但无功，过错一大堆”，那就更不应该骄傲，更不能“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了头，看得太大”。

陈云严肃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人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倒爬不起来。陈云通过反面案例阐明了一个道理：个人的作用是有人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摆正个人位置，摆正自己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的位置，决不能沾沾自喜、居功自傲。

“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个人主义的表现，一方面是没有正确看待功劳，另一方面也没有正确对待错误。陈云认为一个人犯错误除了立场不正、心术不正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未能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于是行动也跟着错了，这种情况很常见，人人皆有。人难免会犯错误，但是态度要正确，“假如你有错误，人家讲了，就请教请教，问一问人家怎样看法，纠正一番，以后可以少犯错误”。但在现实中，往往有人因为要面子，不能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一旦被批评就不高兴。针对这种心理，陈云明确提出：“我们要讲真

理，不要讲面子。”并说：“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

“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应该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共产党人肩负重任，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而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这就深刻揭示了“讲面子”的危害性。

在发言的最后，陈云解释了为什么在党的七大上讲这个问题。他强调当时正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时机，“我们是处在决战的前夜。我们有这样的志向，要解放全中国，使全中国的人民起来，把政权拿在手里。要做这件事，而且马上就要做，开七大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而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决战，全党的任务是要增加力量。增加力量的方法很多，对个人来说，要增加又要减少，增加就是要学习，减少就是把“包袱”放下。陈云指出：“放下‘包袱’也是增加力量。这个力量的增加是不可估计的。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陈云关于“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论述，针对当时党内滋生的骄傲之气提出严厉批评，并分析根源、对症下药，强调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在今天仍留给我们诸多启示。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增强责任担当意识，切实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正确对待批评与监督，勇于自我革命，坚决克服个人主义，努力担负起历史和人民寄予的重托。

制度的功能性远比形式更重要

——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 王正绪

萨缪尔·P·亨廷顿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他的许多著作在全球学界和政界均产生广泛影响。其中，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被视为其学术生涯中最具理论深度和开创性的作品之一，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该书写作时，许多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上民族独立道路。面对这些新独立国家，西方社会和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它们倒向苏联阵营、采纳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此背景下，美国学术界关注哪些社会条件有助于这些国家走向所谓的“民主”——也就是西方式的制度模式。美国政治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因此形成，即认为如果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则它们就会演进成为西方式的制度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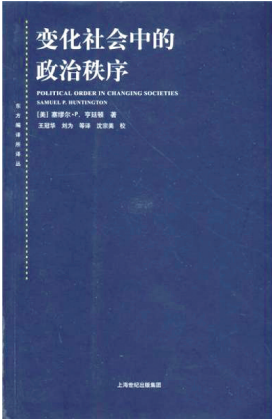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当时一些新兴国家陷入政变频发、社会撕裂与制度失败的困境，亨廷顿指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关键不在于选择“民主”还是社会主义体制，而在于能否构建有效的治理机制。他强调，美国与苏联虽然制度形式不同，但都成功形成了强大的制度能力；而“变化中的社会”之所以陷入危机，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整合力和组织效能的不足。他认为，现代化最深刻的影响，是引发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需求的迅速增长，若没有足够的制度化机制来吸纳这些需求，政治秩序便面临崩溃风险。因此，制度的容量与质量，才是现代政治稳定的关键所在。他以一个经典的关系式概括这一命题——“政治秩序=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换句话说，亨廷顿并不认为通过设立多党选举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体系”就能实现政治秩序。要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要有一个政治体系中的制度是否具备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与凝聚力。他进一步指出，实现现代政治秩序的制度要件包括强有力的政党、专业化的官僚系统、受控的军队等。这是对那些认为政治发展就是要建立西方式的多党竞选“民主”的人的重要警示。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的快速扩张若缺乏制度建设，就会导致政治衰败。他十次尖锐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真正的挑战在于确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他列举当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现象：种族与阶级冲突加剧、政变频发、军事干政、腐败横行、法律制度失效、公民权利受侵犯、政党瓦解等。这些现象表明，这些国家并非处于“政治发展”的轨道上，而是陷入了“政治衰朽”的深渊。通过比较美国与欧洲的政治现代化路径、阐述现代化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分析传统政体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变迁等，亨廷顿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实现稳定与发展，不能迷信某种“唯一正确”的制度形式，而应在具体的政治目标基础上，构建自身能够承载社会动员、调节政治参与、提升治理效能，从而促进公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制度体系。

尽管该书成书在20世纪中叶，但它提出的命题和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今天，对我们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秩序的重要性仍在凸显。在当今世界许多地区，政治秩序的缺失依然是动荡与失败的根本原因。从非洲之角的战乱到中欧国家的解体，再到拉美多国陷入的治理危机，现实表明：经济援助、选举监督等西式治理工具，无法替代本国制度所承载的整合能力与组织能力。秩序不仅是发展的前提，更是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因此，无论是政治学研究还是国家治理实践，都应回到“秩序”这一根本问题，从制度稳定性、社会整合能力与政治参与的组织机制出发，思考国家建设的根本路径。

其次，摆脱对西式民主神话的膜拜。亨廷顿否定了从制度类型来观察政治发展的思路，认为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政治发展的目标并非建立西式的多党竞选的所谓“民主”体制。关于什么是民主，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模式不可能定于一尊。不少发展中国家如阿富汗等，虽然按西方的政治制度形式设立了多党选举等制度，却未完全形成有效治理结构，反而因社会撕裂、政党碎片化和制度失灵而陷入长期动荡。近年来各种研究表明，制度的品质与国家能力的建设，完全不能简单地通过西方所谓的“民主化”来实现。

最后，深刻认识好制度的标准。亨廷顿强调，制度的功能性远比形式更重要。好制度不在于是否符合某种“民主”标准，而在于它能否组织政治参与、表达社会诉求、整合利益分歧并高效执行决策。然而，当前关于中外制度对比的讨论多停留在表面，对更深的价值与认知基础缺乏理解。这也导致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制度体系的误读，甚至错误将其归为“威权”，并据此推演出压制、腐败、动荡等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中国制度在维持政治秩序、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的亮眼表现。因此，要理解制度如何生成秩序，必须回到更基础的制度主义层面，抛弃意识形态先验，关注制度运作的实际功能与治理绩效。这也是阅读该书给我们留下的思考。

读书

（上接1版）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合作，共同挖掘创新增长潜力，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进一步推进互联互通，全面拓展交通走廊运能，实现货物运输集装箱化；同步建设跨境光缆、数据中心，实现数字基础设施联通，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将中国—中亚打造成亚欧大陆全方位互联互通核心枢纽。

推动民生改善取得新突破，为实现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奠定民意基础

民生改善直接关系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依归。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各国人民从这条丝路上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也正是丝路生力之所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中亚合作，更要顺应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关注人民福祉和民生改善，切实将合作成果转化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习近平主席宣布在中国中亚合作框架内建立减贫、教育交流、荒漠化防治三大合作中心，未来两年为中亚国家提供3000个培训名额，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落实到位。积极开展民生项目合作，注重解决人民在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劳动就业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小而

美”项目提升当地人民获得感。在经贸合作中坚持企业员工本地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多元化，为区域内各国创造就业机会，促使就业增长与经贸合作协调和谐发展。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直达消费者的新兴产业，催生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物流配送、电商产品再加工等新职业，让人民直观感受到合作带来的红利。加强职业教育合作，发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平台作用，针对产业需求联合运作职业技术学院、鲁班工坊，开展多层次技能培训，帮助当地青年掌握一技之长。积极开展医疗技术、公共卫生等方面合作，通过资源共享、技术交流、体系共建等方式，提升区域医疗卫生水平，守护区域人民健康。开展减贫合作，分享减贫经验，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制定减贫策略，形成减贫合力，推动区域共同繁荣。

推动人文交流呈现新热度，为实现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搭起心灵桥梁

国与国关系是亿万个体的故事叠加和情感积淀，人民对真、善、美的共同追寻，穿越时空、历经风雨而不变。实现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精神联接是文化纽带。要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友谊的种子在六国人民心中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古丝绸之路

是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之路，体现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新形势下，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要用好历史文化纽带，通过开展联合考古、丝绸之路历史和遗产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博物馆交流等合作，挖掘古丝绸之路蕴含的历史人文价值，凸显各国历史文化中的闪光点，焕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之魅力。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在中亚开设更多文化中心、高校分校、中医药中心等，在中国高校增设中亚语言专业，用一座座桥梁、一条条纽带将六国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加强高校间合作，扩大双方互派留学生规模，让更多留学生在相互学习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文化、播撒友谊的种子。挖掘文化旅游资源，共同开展文化探寻之旅，提升旅游业整体水平，为双方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和中亚五国已结成上百对友城，继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交流活动，增进彼此认知，激活内生动力，编织更坚韧的友好合作之网。落实促进人员往来便利化合作倡议，为人员交流创造更好条件，在常来常往、常走常亲中感知对方的善意与友情。

推动安全合作取得新成效，为实现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和平安宁、国泰民安是六国人

民的共同心愿。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全球化逆流、安全威胁多元化等问题层出不穷。六国地缘相邻、利益交织，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双重挑战，只有通过深化安全合作、携手应对挑战，才能为区域稳定与发展筑牢屏障。新形势下，六国要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和平友好合作，合力打击“三股势力”，加强在公共卫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合作，增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能力，为打造一个长期稳定、和平的地区环境和普遍安全的外部环境而共同努力。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与中亚国家应继续加强协调与配合，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维护共同利益，相互坚定支持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相互坚定支持各自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采取的各项独立自主内外政策，相互坚定支持为维护地区和平、和睦、安宁付出的努力。

中国有句谚语“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中亚也有句谚语“有朋友的人，像草原一样宽广”。中国与中亚在长期交往中建立了深厚情谊，创造了千年丝路辉煌。如今，中国中亚合作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坚信“中国—中亚精神”的光芒必将照亮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壮阔征程，中国与中亚人民必将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上共同描绘出一幅新时代合作共赢的壮美画卷。

（作者系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